

《冯友兰自述》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作者] 冯友兰

[单位] 《冯友兰自述》

[摘要]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

[关键词] 《冯友兰自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冯友兰，北京大学

在傅作义军队撤走以后，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这一带成为“真空”地带。可是社会秩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清华校内，也很平静，师生们生活照常。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淀，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同志在那里站岗。清华的师生也都跑到海淀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叔明也到海淀去了一趟，回来说，她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我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解放军的这类行动，使各阶层人民都对于共产党有了无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不是“王者之师”，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有一天，国民党的飞机打破了清华的平静。那天下午，我从家里（乙所）到工字厅后边滑冰场去看滑冰。乙所的西北面是一座小树林，有一条南北向的路从树林中通过，路的北端就是工字厅的前门。我刚走到那条路上，就有飞机在上空盘旋很紧，我转回家去，刚坐在沙发上，就听见一声巨响，把我震得从沙发中摔出来。从窗户里看见甲所那边，有些人披着被子在路上跑，走出门一看，才知道在我刚才走过的那条路上的东边树林里，落下了一枚相当大的炸弹，把树炸倒了两棵，地上留下一个很大的弹坑。我在昆明住了八年，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空袭，还没有一枚炸弹落在距离我这么近的地方。这枚炸弹距离工字厅后面的滑冰场很近，有许多大人小孩在那里滑冰。如果这枚炸弹落在滑冰场上，那就不堪设想了。事后调查，校内总共落下十二枚炸弹，可是都落在空地上，没有一个人伤亡，也没有什么财产受到损失。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上却说，南京的空军在西郊轰炸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使解放军受到重大损失。为了这件事情，党中央、毛主席给清华打来了慰问的电报。

随着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军的许多机关也到了，同我们直接接洽的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管会，他们驻在颐和园西边的青龙桥。文管会的负责人张宗麟也到清华来了。他对校务会议说：“你们好好地维持清华。”又对我说：“我们对于你的行动曾经作了估计，现在你的表现跟我们的估计差不多。党中央很重视你。”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宗麟又来到清华，发布命令：设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以原校务会议的成员为委员，以我为主任委员。我随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了命令，并且说：清华现在是人民的清华了！在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以后，文管会负责人钱俊瑞到清华宣布：派吴晗为军代表。从此以后，校务就实际上由吴晗主持了。事后我听说，解放北京以前，党中央预先订了一个处理各大学的政策，第一步是“接而不管”。事后我体会到，这个政策是完全落实了。

文管会第一次来清华时，本来就应该派军代表的，可是没有派，而是让原来的那些人继

续维持校务，只派来联络员进行工作上的联系，先是两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后来是原在清华生物系任教员的吴征镒，这就是"接而不管"。过了一段时间才派军代表，这就是真正的接管了。这可见党中央对北京这些大学是很重视的，对于它们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这是我在回忆的时候才体会到的，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体会，也不知道有这个政策。

在南京解放以后，清华校务委员会改组，由叶企荪担任主任委员，又加了学生代表为委员。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写了一封信，辞去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院长，理由是能力不胜。校务委员会叫李广田来对我说："你说的这个理由不对，你担任院长干了几十年，怎么能说能力不胜，应该写政治上的理由。"我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说我曾经两次参加过国民党，虽其时均在国共合作时期，但言论行动错误实多，请辞去一切兼职。校务委员会通过了，派吴晗为文学院院长，我只担任本职哲学系教授。我当时觉得有忽然轻松的感觉，真是"无官一身轻"。

有一天，吴有训来找我，说他碰见徐特立，徐老叫他转告我说，这些都是一时的现象，不要灰心，还要继续前进。过了几天，我也在一个会上碰见了徐老，徐老说："我很想找你详细谈谈，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什么时候有工夫，打电话给我，我派车去接你到我家住几天。"过了几天，我给徐老打电话，他果然派车来了。到了他家里，他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谈他过去的历史。他说，他过去学作八股，总是学不好，只有一次得到先生的一个比较好的批语，说是"尚有一隙之明"。后来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特别注意，他把那几条抄下来贴在墙上，每天要背几遍。他说，他向来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他用劳动得来的，可是"有人说你是唯心。咱们谈谈，谈明白了，以后就可以共同工作了"。我当时不明白徐老的意思，当时我听说，徐老领导了一个委员会，编写中小学教科书，我以为徐老是要叫我去参加那个委员会，我想我对于中小学教育没有兴趣，完全外行，不能参加那样的工作。话不投机，在徐老家里住了一夜，我就告辞，徐老又派车送我回来。

在当时，众人都在反对我的时候，徐老对于我的这种表示，使我对于徐老有知己之感。后来经历得多了，我才感觉到，我当时的了解是完全错误的。在我当时的情况下，徐老的表示大概是代表组织上的意思，并不是他个人的行动。他先讲了他自己的历史，意思是想引导我讲自己的历史。在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方法中，自己讲自己的历史有自我检查的意思。徐老说，话说明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合作了。这个"我们"一方面是我，一方面是党，并不是徐老个人。这个"合作"的意思是很广泛的，并不是只指在徐老当时领导的那个单位的工作。徐老的意思，总的说起来，就是说过去的事只要讲清楚了，共产党还是要你的。可是我当时没有了解这种意思。知己之感应该是对于党的，当然也包括徐老在内。

我是用旧经验了解当时的新事物。这样了解当然是不正确的，所以反应也必然是错误的。上边所说的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在清华遭到国民党空袭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打来慰问的电报，这是对清华的关心，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我是照旧办法，把来电在学校布告栏内一公布，就算完事。还有上边所说的清华刚解放，校务会议让愿留者签名登记。那个时候吴晗还在解放区，他回来以后，向会计课领工资，会计课一查登记表没有他的名字，就不发他的工资。

吴晗在一个会上说，清华规定，凡是从解放区回来的都得登记。我不了解"登记"这个名词的新的含义，大概新的含义是对于有问题的人才称为"登记"，这样一传开了，就说是清华认为到解放区去的人有问题，引起了文管会的查问。在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学校发不出工资，在教授会上有许多人质问，并要我向上面去催，我当时心里很生气，说我在这里是办学，并

不是去讨饭。吴征镒说，这是个思想问题。我当时心里想，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在1949年4月29日，清华举行校庆的时候，周总理派人找我，问我有什么意见。照我当时的了解，周总理所要问的“意见”，是对于国家大事有所“拾遗补阙”的那种意见，那时候的国家大事我看不出有什么“遗”“阙”，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该“拾”该“补”的地方，只好说没有意见。后来才知道，所谓“意见”比我所了解的广泛得多，大至对国家大事有什么看法，小至对个人工作、生活有什么希望和要求，都可以作为“意见”提。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了解，我就会向总理提出，请他把我调离清华，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在清华处境很困难。我举这些例，是要说明，在当时我同共产党接触的时候，虽然说的都是一样的字眼，可是各有各的了解，往往答非所问。在解放之初，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情况，不过我当时在清华处于领导地位，表现得更加明显，更为突出。



1921年北大留美校友与赴美考察的蔡元培先生合影。二排左一为冯友兰，前排左五为蔡元培，左二为罗家伦。

1949年冬天，北京郊区开始土地改革。学校号召全校师生参加工作组。我报了名，叔明也报了名。我们的工作区域是卢沟桥及其附近村庄。卢沟桥本来是一个中外闻名的名胜，又是抗日战争的起点，这就更加有名了。这个地方，是外省的人进入北京的一个关口。紧接着那座桥，有一座城，城墙很坚固。据说，如果北京城不能和平解放，那就要武力攻城，就先以这座城为演习攻城战术的地方。我们到了卢沟桥，同先到的同志会合，全组有十人左右。城内有一所小学，正在放寒假，校舍空着，工作组就在这所小学住下。先是到农民家里吃派饭，后来自己起伙。一直到过了春节才把这一带土改搞完。在工作结束的时候，农民派车送我们回清华，在我家吃了一顿饭，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而去。

在这次土改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养活谁”。从地主的立场看，他和佃户的关系，是互惠的关系：地主有地，农民有劳动力，农民种地主的地，成为他的佃户，土地与劳动力两下配合起来，生产的粮食，两下平分，这不是很“公平合理”吗？地主们还认为，可耕的土地毕竟是有限的，农民则往往过剩；地主对于农民，用哪一家作为他的佃户，是可以选择的；而农民对于地主则没有选择之余地；所以地主用这一家农民作佃户，而不用那一家，对于这一家说，是一种“恩赐”，是“赏饭吃”；而佃户对于地主就是接受“恩赐”，“侍候”地主了。这种“赏饭吃”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是很普遍的。上边对于下边，都是“赏饭吃”，老百姓对于皇帝也说是“践土食毛”，这样说，下边是被上边养活的。地主说，佃户们种的是他的地，他要是不能让这家做佃户，这家佃户就没有吃的，所以是他养活佃户。这本来是地主阶级用以欺骗和麻醉农民的思想，可是沿袭久了，有些农民果然就为这些思想所欺骗、所麻醉，觉得打倒地主阶级似乎不很“合理”，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工作组在开始的时候，反复宣传：并不是地主养活

佃户，而是佃户养活地主。经过反复讨论，农民才把原有的错误思想扭转过来，地是农民种的，如果农民不种地，地主们什么吃的也没有。

我当时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地主们说，地是我的，何以见得地是你的？无非是因为有国家法律的规定，你所靠的无非是国家法律的保护。可是在封建社会中，所谓国家法律，就是你们为了保护你们的利益而制订的。农民革命就是不承认这种国家法律。既不承认这种国家法律，那所谓“地是你的”就没有什么根据了。你无缘无故分去佃户的劳动果实，你不劳而获，这就叫剥削。

经过这次参加土改，我了解了剥削的真实意义，也了解了农村划阶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看剥削和剥削的程度，受剥削和受剥削的程度。我小的时候，在老家看见有些亲戚、族人，有的雇用长工，自身也参加劳动；有的雇用长工，自身不参加劳动，可是也在做些事，总觉得他们跟真正的地主有所不同，但不同在什么地方，说不清楚。经过这次土改，我知道，前者是富农，后者是经营地主。后者自身不参加劳动，从这个意义说，他是地主；但是他对于农业生产是作了些安排即经营，所以他是经营地主。

我又进一步认识到，“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历史的分期，也是以有没有剥削为标准。社会的种类虽然有多种，但主要的只有两种：一种是阶级社会，也就是有剥削的社会；一种是无阶级社会，也就是没有剥削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以阶级斗争消灭阶级，以达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这种社会，应该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这是没有人能否认的。唯物史观的贡献，在于证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理想不但是应该要实现，而且是必然要实现的。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分别。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接近了全国性的胜利，北京郊区久已平静无事，但是在我们去没收地主财产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武装同志带着武器在前面开路，工作组人员和农民群众跟在后面，成为一支很雄壮的队伍，这是武装革命的象征。没收地主的财产，把他们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给农民，这是中国历史中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理想，可是向来没有实现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才能实现这个理想。当时我们的队伍，就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象征。

1951年秋天，中国派了一个赴印度、缅甸访问的文化代表团，我也是团员之一。团长是丁西林，副团长是李一氓，秘书长是刘白羽。当时中国还在受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先到香港，由香港乘客轮到仰光，由仰光乘飞机到加尔各答，由加尔各答乘飞机到新德里。当时是中印友好的黄金时代，中印两国人民都认识到中印两国是亚洲的两个大国，中印文化是所谓东方文明的两个支柱。在近代，两国都沦落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各自建立了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这种共同的文化的历史的背景，使两国人民都觉得亲如兄弟，都认识到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前进，开辟亚洲的新局面，建设亚洲的新文化。我们在印度，到处都受到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群众所献的花环，如果都戴起来，就要有“灭顶之灾”。走到路上，两边的群众都用鲜花向我们撒来。所过之处，路上铺满了鲜花，有的时候，还被群众包围起来，走不出去。我在佛经上看到有所谓“天女散花”和“香花供养”，这时身临其境，才体会到那是怎么一回事。

印度是一个总名称，包含许多小国家，初到印度，好像是初到欧洲一样，好像是回到了中国春秋时代诸侯割据的局面。在印度的历史中，虽然也出现了几个王朝，但是都没有达到

真正统一的局面，或者是虽然达到而没有维持下来。英国占领了印度，仍旧维持这种割据的局面。只是在这个局面之上，加上一个太上皇帝，使之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太上皇帝就是英王，他统治了印度，但是他的统治是通过那些原有的小国国王而进行的，这就叫“分而治之”。这也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帝国主义保护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代理帝国主义，互相利用，狼狈为奸。

所苦的就是印度劳动人民，他们是在双重的剥削和压迫之下过日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的势力退出了印度，甘地和尼赫鲁的国大党接管了印度的政权，国大党对于印度的统一，作了不少积极的贡献。在全国范围内，以总统替代了英国的总督（副王），但总统并不亲自处理国家事务。国家事务由总理处理。总理向国会负责。国会由选民选举。这完全是英国那一套。在原来的各小国家之内，也实行这一套制度，把原来的君主改为一个不掌实权的虚位，失去政权，由这个国家的总理掌握，总理向这个国家的议会负责，议会由这个国家的选民选举。一个虚君制套一个虚君制，这样一套，那些小国家原来的君主都变成虚君了。中央的总理能指挥各小国家的总理，中央的权力大为扩大。照印度人讲起来，这是一个不流血的革命，由封建割据不经过武装斗争就改成了中央集权的局面。原来各小国家的小君主，为什么能自愿地交出政权呢？这有一套赎买政策。当时也听说，有人认为，赎买的价钱太高了，计划削减。

当时也有些印度朋友对于社会主义不很了解，或者是很不了解。忘记是在哪个地方，在一次会上，碰见一个人，他双手拉着我说：“你来得很好，我有一个问题，请你给我一个回答。”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平等，那么谁还劳动呢？如果都不劳动，社会怎么能存在下去呢？”我说：“人人平等，并不是人人都不劳动，而是人人都劳动，如果人人都劳动，社会只会更繁荣。”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不过他没有接着再往下问。

无论如何，当时的印度人都认为，中印两国为了脱离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所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国走的是武装革命的路，印度走的是和平过渡的路。这是事实，我们也是这样看，问题在于哪一条路比较优越。我们认为，革命道路优越，印度的左派人士、青年学生也认为是这样，印度的右派人士，以及上层社会中的人，认为印度的道路优越。他们认为，和平过渡的路，走起来像是缓慢，但是不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武装革命的路，看起来是直截了当，但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算起账来，还是和平过渡的道路比较合算。主要的问题还不在此，而在“和平过渡”是不是渡得过来。青年们显然有不耐烦的情绪，有个学生对我说，中国的解放虽然比印度晚了一些，可是中国现在已经是遥遥领先了，照印度现在的样子，一千年也赶不上。

总的说起来，印度当局对于中国的代表团是欢迎的，招待的规格是很高的。在新德里的时候，我们代表团中有一半住在总统府。从总统府内的陈设以及服务人员的服装看起来，大概还是以前的那个排场。这个以前，可以上溯到蒙古王朝，至少可以上溯到英国的总督府。德里大学，赠送了代表团团长丁西林和我以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德里大学是印度的最高学府，按照规定，它的校长是由印度总统兼任，在赠送学位的仪式上，总统亲自出席，以校长的身份发给我们证书。在接受证书以后，照例要致答词。我在答词中说，听说印度学术界有一个传统的规矩，一个学者可以把他的研究成果归纳为几句话，作为他的立论，在一种学术会议上提出来，请到会的人辩驳。如果他的立论被驳倒了，那就要自杀以殉。在古代，中国到印度的留学生很多，其中也有立论请听众辩驳的，还没有听说谁被驳倒。现在中国又有一个

立论，请求辩驳，不过这个辩驳，并不是用言语进行的，是用实际行动进行的。辩驳的双方，哪一方正确，哪一方错误，也不是用空言所能决定的，是要靠实践才能决定的。中印两国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是做出这个决定的裁判者。我所说的这个辩论，指的就是上面所说的两条路线的问题。

我们回国以后，印度派了一个德里大学的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北京大学作为接待单位。印度代表团中，有一个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对我说，不知道什么缘故，印度所缺少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奋发有为的精神。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火车站，他又对我说，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我明白那个缘故了，这就是经过革命和没有经过革命的分别，印度所缺少的就是一场革命。我当时觉得，他的这个话说得对。在五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中，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个阶级、哪个阶层，都有他所说的这种精神。只要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的人都是同心同德，全力以赴。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大概指的就是这种精神。十年动乱，表面上打着革命的大旗，实际上是打击了这种精神，挫伤了这种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鼓舞起来的，一鼓作气，势不可挡。经过十年动乱，有些人的理想幻灭了，信念动摇了。气可鼓而不可泄，要是泄了气，再想鼓起来，就不会像泄气那么容易，这是十年动乱给中华民族的最大的创伤、最大的后遗症。我希望这只是我上边所说的那个立论的一个插曲，我也希望中印两个民族虽然各有各的路，但还是要携起手来，共同前进，为东方文明的复兴作出贡献。复兴的东方文明，当然不会和以前的完全一样，但只要它能使东方的民族得到它应有的地位，那就是新的东方文明。

因为印度的地方大，应该看的東西又多，所以我们代表团分为两组，一个科技组和一个文物组，从新德里分两路出发，到各个地方去。我参加了文物组，对于印度在科技方面的成就所见不多，一般的印象是，英国在印度的物质建设方面是做了些事，这是由于它要以此赢利，就当时中印两国的情况说，印度在物质方面如工矿交通之类是比中国发展得多了。至于在文化方面，英国好像没有做很多的事，因为在这方面，它无利可图。大概殖民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都是这个样子。殖民主义国家，以它的殖民地为它的生产资料的来源和销售产品的市场，这就是说，它从殖民地掠夺原料，运回本国，作了加工，再将成品运回殖民地，卖给殖民地人民，一买一卖，从中取利，这就是剥削。在文化方面，没有买卖可做，既无买卖可做，任凭殖民地人民愚昧也罢，无知也罢，与它无关。而且它正是利用殖民地人民的愚昧无知，以减少他们的反抗，使他们无法反抗，也根本不知道反抗。在文物方面，我们所看到的，大都是印度原有的东西。在这些方面，确是开了眼界。在中国书上，常看见“玉堂”这一类名词，这种所谓“玉堂”，大概是指，这一类地方的社会地位的清高，并不是说真有用白玉盖造的房子。北京的汉白玉，云南的大理石，也不过是作为名贵建筑上的一种装饰品。那些建筑的本身，还是用砖瓦木料建筑起来的。在印度就不然，印度的名贵建筑，如宫殿、陵寝之类，都完全是用石料建筑起来的。

有一座妃子的墓，是一座高台，台上有房屋，藏着棺材，整个的建筑，完全是用汉白玉、大理石那一类的石料构成的，没有一点木料，没有一点杂色，真是粉装玉琢。我当时想，这才真可以叫做“玉堂”。像云冈、敦煌那一类的石窟，那一类的雕刻，就够伟大的了，确实是伟大，可是印度有一座整个的庙，是从一座山刻出来的，整个庙有好几层大殿，大殿内有各种佛像，大门前有一对大旗杆，都是从那座山刻出来的，并不是从别的地方刻好运来的。听说全部的工程，用了几乎一百年的时间才完成。印度的建筑师不相信，不用石料专用木料就可以构成大建筑物。他们或者认为，用木料构成的建筑不是建筑。一直到五十年代，他们的建筑师们来了，见了故宫，据他们说，他们这才相信专用木料也可以构成大建筑物。

不过在建筑方面，中国也有一点可以见长的，像故宫那样的建筑，无论你说它是建筑或者不是建筑，它的那种宏伟广大、庄严肃穆的气象，是它所特有的。它将有的那种气象，就造成那种气氛。造成气氛，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要素。在旧德里，也有一座故宫，名叫“红堡”，也主要是用石料构成的，这批建筑的坚固和雕刻的精致，那是北京的故宫所不及的，但其气象，就小得多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也是如此。

莫斯科红场是克里姆林宫门前的一个广场，其地位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但其气象也比天安门广场小得多了。这不仅是一个建筑材料问题，也不只是所占地面的广狭问题，更不仅是建筑师们的技巧问题。一个首都的宫殿，是那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民族的精神面貌的反映。杜甫的《龙门》诗中说：“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皇居的气象，是随着这个国家的疆域大小和国势强弱不同而不同。北京的故宫建筑于明成祖的时代，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的时代，大一统的中国正在巩固的时代，这个大一统的精神面貌，反映在故宫的建筑上，就成为一个宏伟广大、庄严肃穆的气象，这个气象造成一种气氛，这就是故宫的建筑艺术伟大之所在。清朝在沈阳的故宫，其规模气象，和北京的一个王府差不多。这固然是由于它在那个时候人力物力是有限的，当然有一个人力物力的问题，但不仅只是一个人力物力的问题。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只是当时莫斯科公国的精神面貌的反映。旧德里的红堡也只是当时诸侯割据中的一国的精神面貌的反映，所以它们都不反映大一统的精神面貌。由此可见，中国的大一统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常可贵的遗产，我们子孙万代都要继承这个遗产，保持这个遗产。

在印度走了一圈之后，又回到缅甸。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到过仰光，那一次是路过，这一次到仰光，是正式进行友好访问。印度是佛教起源的国家，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佛教了。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一个佛教国家不仅只在于寺庙的香火兴旺，僧侣众多，而在于信仰佛教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照缅甸原来的制度，僧侣是受全社会的供养的。寺庙中的僧侣，自己并不起火做饭，他们每天早晨到社会中各家去就食，说好听一点，就食是受供养；说不好听一点，就食就是乞食。佛教并不以乞食为可耻，而以为乞食是僧侣应有的权利。每家每天都把它所有的最好吃的东西供养僧侣，这是它的义务。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在一生之中，都要用几年的时间在寺庙中当僧侣，只有当了几年僧侣，才算是完成了他应该受的教育。这种制度已成为全社会的风俗习惯。据说这种制度现在已开始崩坏了。这种风俗习惯，已经不如以前那样普遍。可是我们在仰光还是看见，有不少的僧侣成群结队，到各家去就食。也看见，有些小帆船在河中行走，上边有一个青年和他的父母以及家族成员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往寺庙中去，据说这位青年就是要往寺庙中出家当僧侣，亲属人等都去欢送。

过了几年，再把他接回来还俗。

在缅甸访问以后，又坐客货轮到香港，由香港经广州回到北京。当我们在国外的時候，国内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在我回到清华时，运动已经接近结束了。接着就是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党中央对于北京的大专院校，已经经过了“接而不管”、“接管”这两个阶段，现在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院系调整”了。在调整的过程中，与我直接有比较大的关系的，是清华和北大的合并，清华以工科为主，把原来北大的工科方面的院系归并到清华，把清华文法科方面的院系归并到北大。清华还设在原来的校址，成为一个多科的工科大学，但仍保持“清华大学”的名称。北大迁到原来燕京大学的校址，当时称为综合大学，也仍保持“北京大学”的名称。原来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因为原来是外国人办的，当时认为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都取消建制，其院系各归并到其他学校。在哲学系方面，调整的幅度特别大，全

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除北大外都取消了，全国只有一个哲学系，其他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在北大的哲学系。

调整集中以后，教师进行评级，因为过去的政治关系，我被评为四级教授，不过这样时间不长，到 1954 年又推翻了 1952 年的评级，重新评级。系领导通知我说，我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且说，国务院在全国设了五十个名额的学术补贴，我也在这五十名之中，每月于一级教授工资之外，加补贴三百五十元。可是后来这个补贴的计划并没有实行。听说当时科学院也要仿照苏联的制度，设院士和通讯院士，后来也没有实行，仅只设了学部委员，我也被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后来又被选为常务委员），每月给补贴一百二十元。科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把北大哲学系的教师调去了一部分，我也被任为兼职研究员，并兼任中国哲学史组组长。

瑞士的日内瓦市办了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会，每隔两年开大会一次，邀请各国人士到会，就预先指定的题目作讲演或参加讨论。1956 年 9 月开第十一次会议，中国被邀请的人，是郭沫若和我二人，指定的题目是《传统和创新--实际世界中的古和今的争论》，郭沫若没有去，只有我一个人去参加。

北大的领导加派了任华作为我的秘书，一同前去，以便在路上照料；如果会中临时出现讨论的问题时，可以商量应付。我的讲演的题目是《中国文化的三个主要传统》，我认为这三个主要传统是民主、科学、和平，讲演中引证了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些资料以为说明，这些说明是有意义的，特别是提出和平这一个传统，在当时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就这次会议所提出的题目说，有点文不对题，因为我在讲演中，只说到传统，没有说到创新，因此也就没有说到古与今的斗争和辩论，而这一点正是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

这个题目本来是我感兴趣的，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感兴趣的问题。可是当时我正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之中，旧的看法已经抛弃了，新的看法还没有建立起来，思想上处于青黄不接之际。虽然写了一篇讲演稿，但是其中并没有什么自己的新的东西。不过这一次我在国外停留比较久，听到一些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一些看法，以及我国外事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我在动身往日内瓦以前，就先用中文写好了一篇讲演稿，写好以后，找人翻成法文，经过几次修改，才把翻译稿定下来。到了瑞士，经过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经过大使馆审查，他们又把译文作了一些修改。可是还有一些问题：在讲演的时候，在会场上还得有一个人念这一篇讲演稿，念是照着稿子念，但是也需要发音正确，口齿清楚。这就要靠大使馆去找这样的一个翻译了。据说，大使馆中有一个最好的法文翻译，可是当时请假回国去了。除他之外，就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大使馆的同志们说，有一个代表团上意大利去了，它有一个翻译据说很好，这个代表团不久还要回到瑞士，可以借用他们的翻译。过了几天，那个代表团回到瑞士了，就问那个团长他的翻译怎么样，那位团长说：“我不懂法文，我也不知道他翻译得怎么样，不过在需要翻译的时候，我说了一大段，他只用几句就翻完了。”翻译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幸而有一位日内瓦大学的教授，听说我们有困难，就自告奋勇，说他可以在会场上替我念法文稿。

在各个讲演人都讲了以后，就开辩论会。参加辩论的人向讲演人提出问题，由讲演人答辩。

每次参加讨论的人，都有十几个，坐在讲台上，一般的听众，坐在台下。等到我要去答辩的时候，翻译的问题又来了，总不能再去麻烦那位日内瓦大学的教授，只好另想办法。有人忽然想起来，联合国在日内瓦有一个办公处，他们有的是翻译人员。为什么不找他们帮忙呢？找到联合国办公处，请来了一位翻译，可是到时候我说中文，他用法文翻译，只翻译了一段话，就不行了，倒不是他不懂得我的中国话，而是因为他不清楚我说的话的内容。那位主要提问题的人，就改说英文，我的英文虽然不佳，但也可以用英文回答，于是翻译退席，会场上就改用英文了。第二天的法国报纸对于这一场辩论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报道。

照法国的和瑞士的报纸看起来，他们对于我的讲演，都感觉失望。他们所失望的并不在于我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而在于我没有提出同中国官方不同的观点，认为和大使馆的调子差不多。他们希望我是一个同官方持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一点上我确实辜负了他们的希望。他们对于任华的任务也有些推测，据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在派出一个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出国的時候，总要还派一个党员干部跟着，作为监视。

其实任华并不是共产党员，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也是一位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

在日内瓦的时候，碰见了一位意大利朋友，他说，在意大利威尼斯，不久将开一个类似日内瓦会议的会，要我去参加。我请大使馆打电报到北京请示，回电说可以参加。可是距威尼斯会议的会期还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日内瓦等候，天天同任华跑旧书店。原来我们来的时候，科学院给我们一笔钱，托我们替科学院图书馆买书。任华和我对于这样的事都感觉兴趣，认为是一个好差使。

在欧美的大城市中，都有一个区域，专卖旧书。在这个区域中，满街都是旧书店和旧书摊子，喜欢书的人到这里可以随便翻阅，遇见喜欢的书，当时付钱带走。有的时候要想找一种书，好久找不到，忽然在旧书摊上碰见了，好像碰见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有如获至宝之乐。像北京以前的琉璃厂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北京这个大城市的一个特点，可惜现在空有这个地名了。有许多以前有名的旧书店，改成了卖酱油醋的铺子，真是大煞风景。这也有其客观的原因，在封建时代或资本主义国家里，旧书铺的书，有出有入。旧书卖给喜欢书的人，等到他们死以后，他们的藏书就又流入市场。书就像其他货物一样，在市面往返流通。旧书铺有买有卖，它们的书有出有入。可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人藏书家没有了，收买旧书的就只有图书馆，可是图书馆的书是有入无出的，书一进了图书馆，对于爱好书的人说，就好像是“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在刚解放以后，旧书是很不值钱的。在提出“百家争鸣”以后，各地区新添了很多图书馆，这些新的图书馆都是“家徒四壁”，到各大城市去收书。有一年我在上海，上海新开了一个古旧书店，开市的那天，我去看，果然古旧书不少。

第二天我又去，听书店的人说，发生问题了，有一个地区收书的人来看了一遍，说所有的书他全要。后来同这位收书的人商量，说我们这个店刚才开门，你要把书都包了，我们这个生意怎么做呢。商量的结果，只卖给他一半。在十年浩劫中，古旧书首先遭劫，有些人的书被抢去烧了，或者被迫自己烧了，或者被迫拿到市场上去卖，价钱是论斤的。书的价钱比白纸还便宜，因为它是废纸，只有成为“还魂纸”的资格。当然，这些都是个别的例子，但是古旧书籍有入无出，则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的。当然这也是好事，古旧书籍都被收藏起来，不在市面上往返流通。但是古旧书店的货源断绝了，它们的存在也就成为问题了。有人提倡，要恢复琉璃厂，我觉得这也是建设首都的一个方面。但是，琉璃厂的街道房舍是可以恢

复的，卖酱油醋的可以叫他们恢复旧业，可是古旧书从哪里来呢？就是弄来一点，也是越卖越少，它们的生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琉璃厂只会成了一个可以凭吊的古迹了。

在日内瓦住了有大概一个月的样子，威尼斯的会期到了。

我们就离开瑞士往意大利，到了威尼斯。我在 1933 年往英国去的时候，已经经过了这个有名的地方，二十多年以后又到这里，觉得风景依然如故，没有多大变动。这个有名的地方，确实是特别，它是在海滨附近的一群小岛上建筑起来的。有些小海岛，硬是人工造起来的。各个海岛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用桥把它们联系起来。桥下边的海水就成了街道了，用小木船在上面行走。然后用一座总的大桥把这些小岛和陆地联结起来，好像是一座神山，不但可望，而且可即，不但可即，而且可以通过大桥到神山上游览。仙山琼阁，成了人间福地。这个地方，在欧洲称为"水城"。在中国的城市中，苏州有其意，但是苏州的建筑和园林都藏在围墙之中，不能有目共睹，不但不可即，而且不可望，这就有些煞风景了。在开会中，有人发言指责中国不重视传统文化，说故宫也被拆了，长城也被挖倒了。我发言说，我是刚从北京来的，并没有这些事实，不但没有这些事实，而且故宫已经重新油漆，长城也受到保护，那位发言人所说的显然不是事实，他在会上散布这些谣言，显然是有意诬蔑，谎言是很容易驳倒的。但是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确有许多破坏古代文物的事情。这些事情虽然在五十年代还没有发生，但是有这一类的倾向。这种倾向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就成为极左路线的一部分了。

1956 年是佛教教主释迦牟尼逝世的二千五百周年。当时的印度政府为了扩大印度在佛教国家中的影响，举办纪念大会，邀请佛教国家和世界上佛教

徒的团体，派代表团去参加。

中国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喜饶嘉错，秘书长是赵朴初。

团员之中，有西藏的达赖和班禅，有内蒙古的一位活佛，还有僧人和研究佛教或佛学的学者

。我不属于这些类型，大概是因为在过去所写的哲学史中，讲了一段佛学，也被邀请，作为团员之一。代表团分为三路出发，达赖和班禅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直接从拉萨出发，陆行到中印边境，改乘印度的飞机到德里。他们两位虽然名义上是代表团团员，但实际上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到印度以后，印度对于他们也是分别待遇，待以外国宗教领袖之礼。有一小部分团员，由喜饶嘉错和赵朴初率领，先到尼泊尔释迦牟尼诞生的地方朝拜，然后由尼泊尔到德里。我们大部分团员由巨赞率领，经过昆明、仰光到德里。还有一位蒙古的代表也到北京来同我们一起往印度去。在路上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从北京坐专机到昆明，到了昆明以后，打算第二天坐飞机到仰光，由仰光改乘到印度的飞机，那架飞机是下午两点从仰光飞往印度的。

昆明的民航站站长一合计，说我们赶不上仰光到印度的飞机了，我们这里飞机飞到仰光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因为仰光的时间比昆明早一个钟头。我们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叫我们的飞机提前一个钟点从昆明起飞，他说不行，因为飞机是靠无线电波导航的，根据中国和缅甸通航的协定，仰光从上午九点才开始向昆明放送无线电电波，所以我们最早也只能在上午九点起飞。我们说，我们已经定了从仰光到印度的飞机票了，若是赶不上，票就作废了，

这笔价钱不在少数，国家岂不受很大损失。他说，那也没办法，你们赶紧想法退票吧。我们信以为真，就叫巨赞打电话到北京想办法退票。巨赞就往北京的中国佛教会打电话，佛教会往外交部去联系，然后又打回来电话说，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外交部找不着人。人家没有办法，只好照原定计划，第二天上午九点自昆明起飞。

第二天九点起飞，先到缅甸的旧京曼德勒，一看时间还很早，原来时间越往西越晚，缅甸的时间比昆明的时间晚一个钟头，那位站长误以为早一个钟头，所以本来没有问题的事情就有问题了。飞机到了仰光，恰好在两点以前。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同志们在飞机场迎接，并且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饭。他们说，你们到的正好，不早也不晚。大使馆的同志们说，幸亏你们没有退票，买同一架飞机的十几张票，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误了这一架飞机，短时间内走不了，就误了开会的时间。

我们下了飞机，吃罢饭，恰好往印度的飞机到了。到了夜间就到了加尔各答。由加尔各答到了德里，会合了从尼泊尔来的那一部分代表团团员。不久达赖和班禅也到了，不过他们并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参观的路线，也不相同。周恩来总理也在这个期间到了德里。他是去和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在那个时候，中印关系还没有破裂，印度在表面上招待周恩来的礼节也很隆重。周恩来到的时候我们都到飞机场去欢迎。周恩来坐的是印度总统的专用飞机，还有四架战斗机护航。在飞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中，周恩来坐在台上，达赖和班禅站在两旁，好像两位侍者，象征了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也象征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我想这一定给印度人以深刻印象，因为他们都认为达赖和班禅是西藏人的精神领袖。

我们于1956年11月18日离京启程，印度的纪念会活动是11月24日至29日。然后在12月上旬在印度参观。我们在印度期间，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参观了释迦牟尼所到过的一些地方，有许多地方都是印度的考古学家新近发掘出来的，修补的痕迹犹新，有的地方修补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在我们这个代表团中，和尚和信徒们认为到这些地方是朝圣，我们这些人则认为是参观古迹和印度的考古学工作。印度政府和考古学家也认为这些工作是一种考古的工作。印度政府邀请我们来是为了参加纪念释迦牟尼逝世两千五百年大会。

在德里开了这样的一个大会，尼赫鲁以下的印度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可是在我们参观的过程中，虽然到过许多地方，并没有碰见一个印度的佛教和尚或尼姑，在释迦牟尼的墓地（坟墓就是一个很大的土丘，杂草丛生，毫无标志）却碰见了一位中国和尚。他是在民国初年从四川步行到印度的，路上走了十几年。他到释迦牟尼墓地的时候，那个墓地更是一片荒芜。他在一棵树上，搭了一个巢，晚上睡在巢里，下面很多毒蛇，他也不怕。每隔几天，他到附近的城市去乞食，乞来够几天用的食物，他就又回到树上。一直到最近，考古学家才带着人来把墓地清理了一下，印度政府还为他在墓地附近盖了一间房屋。我们也到他的小屋里坐了一会儿，他这间小屋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但是在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又在一个地方，倒是看见了一座佛教庙，可是里边住的是一位中国尼姑。除了这一座庙和这两位中国僧侣之外，再也没有碰见关于佛教的活动了。我们都知道，佛教在印度是衰微了，可是没有想到，它不但是衰微，而且可以说是绝迹了。

1957年7月我又到华沙，参加了一次国际哲学会议。这个会议是国际哲学研究所召集的。这个研究所设在巴黎，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实际上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出钱办的。它每两年召开会议一次，会议地点每次不同，这一次地点指定在华沙。因为我国当时还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以前的会都没有参加。这一次会，我们先派艾思奇到华沙，向波兰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了解情况。因为会议既在华沙举行，实际上主持、布置会议的就是这个研究所了。艾思奇回来以后，经过研究，决定参加。派潘梓年、金岳霖和我三个人去，还有一个俄文翻译，以潘梓年为团长。会议于7月17日开幕，7月27日结束。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哲学史中的知行问题》。

会议中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界情况和我们当时的哲学界情况，不大相同。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着重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生中的发展规律。这些研究，在他们看起来都是大而无当、漫无边际的问题。他们所研究的，是他们所谓专业性的问题，在我们看起来，都是钻牛角尖的繁琐哲学。所以谈起来几乎是没有共同的语言，很难交锋。即使有交锋，也往往是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在开会的形式上也有不同。会议规则上规定，宣读论文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五分钟。讨论时，每人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他们所谈的都是些小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可以说明自己的意思。我们所谈的是些大问题，往往说了半点钟还没有真正说到题目。即使在他们中间，因为所讲的问题太专业化了，也往往使人难以了解。

有一次，有一个人上去，讲了一大篇，讲了以后，听众都相对无言。有个人问我：“你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没有？”我说：“没有，你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这样子开了几天会，并没有什么收获。如果说有一点收获，那就是认识到他们和我们之间有一个鸿沟，不能用语言文字逾越。会后他们对我说，国际哲学会议（即1934年我在布拉格参加过的那个会的会议）要我去参加，我问潘梓年应该如何答复，潘梓年未置可否，大概是认为参加这样的会议没有多大意义。这种认识我也是有的，因此对于他们的邀请也没有作明确的回答。后来接到这个哲学研究所的通知，说是已经选举我为该所的正式成员。以后每两年都有一次通知，说是在什么地方开会。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兴趣不大，所以也都没有给他们回信。久而久之，就断绝关系了。

我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过了几天，有一个解放军骑着摩托脚踏车到我家，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的下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我知道，这是毛泽东派专人给我送回信来了。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

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有一个会开汽车的朋友告诉我说：开车开到熟练的时候，车就像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车的四个轮子，就好像自己的两条腿一样。一个人在人丛中走来走去，但不会碰倒一个人。一个会开车的人，在众车之间行走，如果车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决不会碰车。哪个地方车能钻过去，哪个地方钻不过去，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就可以决定的。我想，一个战士用他的武器，到最熟练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武器就成为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脚一样，达到这种程度，就叫做“化”。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说出那样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那就是采取老实态度。

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

1957年4月11日，是叔明的二姐任锐同志的“忌日”，我同叔明到任锐的墓地（万安公墓）去扫墓，回到家里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钟了。刚一进门，就接到电话，说是毛主席的秘书打来的，说毛主席请我去吃午饭，客已经到齐了，请我马上去。我向学校要了一辆车就去了。到了中南海颐年堂，看见了金岳霖、郑昕、贺麟，他们先已经到了。那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们都坐在西头那一间内谈话。毛泽东问我说：“方才找你找不着，你是在上课吧？”我说：“不是上课，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毛泽东说：“任锐同志是孙维世的妈妈。”我说：“是的。”接着，胡绳也到了。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打过笔仗的人。”毛泽东问郑昕是哪一省的人，郑昕说是安徽的。毛泽东说：“你们安徽出过曹操，曹操是个大人物，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粮食的重要。”说着，就起来往屋子的东头那一间去吃饭。江青也带着小孩们从后面出来了。她那时候看着是一个家庭妇女的样子，吃完饭就又带着小孩们到后边去了，终席没有和客人们谈过一句话。照当时的座位次序看起来，那一次的主客是周谷城。在端上饭来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吃饭以后，又回到西头那一间去谈话。

客人们中间有一位人民大学的同志，说他写了一篇关于逻辑的文章，报刊压着没有发表。毛泽东很不以这些报刊为然。这位同志就向毛泽东汇报他的看法和他的文章内容，他讲的时间相当长，毛泽东始终注意倾听。别的客人都很着急，因为他们都想听毛泽东的议论，可是时间被占去了。这位同志一讲完，毛泽东就站起来了，客人们也只好跟着站起来。毛泽东把

客人们一直送出丰泽园的大门，看着客人们上车。

1957年毛泽东的那两篇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我当时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讲的时候，正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的时期，出席大会的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他的讲话。他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会场中的空气非常活跃。在以后听众的发言中，马寅初讲了人口问题、节制生育的重要。

我也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我和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家里开，由他主持，上边所说的颐年堂的当中那一间就是会场。当时我已经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那篇文章，其中说，一个命题有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抽象意义可以继承，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继承了。我们常说“学习”，还有一个刊物名叫《学习》。孔子所说的“学习”的内容是诗、书、礼、乐、春秋，或者是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它的具体意义，这是不必继承也不可继承的，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继承。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二部分将要详细讨论。现在只说，毛泽东一看见我进去，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在开会中间，毛泽东叫我发言，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我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这一段经过，使我联想到上面所说的在1949年徐老给我说的那几句话：“过去的事情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共事了。”毛泽东叫我参加党的会议，这就是认为可以共事了。原来共产党叫徐老对我做思想工作，经过了将近十年，才算是达到目的。可见过去的事是不容易说清楚的，思想改造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见效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为新中国服务。这是因为我们所经过的革命，是从一种社会制度变到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这和以前中国历史中的改朝换代的变革是根本不同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这些阶级可能是奴隶主阶级，或是地主阶级，或是资产阶级，其所用的剥削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其为剥削则一。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其阶级立场也就是剥削阶级的立场。如果不把这些立场转变为劳动人民的立场，他就不能为劳动人民服务。他可能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愿望，这种愿望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事情并不是只凭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毛泽东说，不可以简单化。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后来正是把这些不可简单化的问题简单化了，而且把简单化推到了极点，这就形成了十年动乱的浩劫。

1962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我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一点我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和将来的计划。当时的执行主席是陈毅，事后有人告诉我说，陈总说我的发言很好，其中讲的有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到闭会那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我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来就座的时候，看见我，就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我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了老态。”他又问了一遍《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且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我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在这一次谈话中，无论是就谈话的内容或谈话的态度说，毛泽东都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以后，我写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闭会的时候，毛泽东又接见。闭会之后，主持会的人，送我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的是毛主席和我握手时的像，也照上了其他一些人，一个是周扬，一个是刘大杰，一个是周予同。我就此作了一副对联：

执手感关怀，三人并列文、史、哲；

集会明任务，一笔齐扫帝、反、修。

这是副"绝对。刘大杰是搞文学史的，周予同是搞历史的，我是搞哲学的，这就是"三人并列文、史、哲"。下联对帝、反、修，但不能再出现"三"字，就来个"一笔齐扫"了。

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凡是中国人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上海黄浦滩外滩公园门口，帝国主义者立了一个牌子，上边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华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中国人。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剥削和压迫，当然是有阶级的意义，也有民族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固然也剥削、压迫他们本国的劳动人民，但是对于殖民地的人说，他们是代表他们的整个民族压迫殖民地的人的整个民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者，挡住了他们的侵略，形象地说，就是推翻了"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仅压在中国劳动人民的头上，也压在所有的中国人的头上。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不仅是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也是对于全中国人的解放。北大有一位教授，在美国有很好的职业，他听说解放军在解放南京的时候，用江阴炮台的大炮扣留了英国的紫石英号炮舰，他说："好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他马上辞职，冒着危险回到中国。

"中国人站起来了！"这是毛泽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的。毛泽东是代表全中国人、整个中华民族说这句话的。在1971年中国进入了联合国，梁漱溟给我来了一封信，说这是一件大事，要找我谈谈。我请他到我家里来。他来了，对我说，中国进入联合国，标志着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的地位了，这是我们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就向往的。这说明共产党毛主席确实是领导中国人民，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确实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压在大山下面的都翻身了，整个的中华民族都相信这一点，真是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无限的崇敬和热爱。这并不是个人迷信，这是像孟轲所说的"心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并不是迷信，因为这是实践证明了的。

上边所说的，不仅是我个人的心情，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情。当我尚在美国上学的时候，罗家伦有一次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有些话在当时那样有威。黄花岗烈士在广州起义，虽然只有七十二个人，可是他们的话，他们的行动，就是有威。他们虽然失败了，但是辛亥革命不久就起来了，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完成了他们的志愿。"我说："缘故是很显然的，有些话，有些行动，之所以有威，就是因为这些话和行动，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在解放后那几年内，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话和行动，就是代表全中国人的意志和愿望的，所

以它们有威。在五十年代，共产党毛主席的指示，确实有威。这个威并不是孟轲说的"以力服人"的那种威，而是"以德服人"的威。这不是霸道，而是王道。这些字眼看起来有些陈腐，但是确有其正确的意义。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这个威就逐渐削弱了。原因何在，我现在不打算讨论，也不能讨论，因为有些事实我还没有弄清楚。我只能就我所亲自看到的一些现象，如实地记下来，以备别人或我自己将来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各种刊物上都引马克思的话：社会主义国家一天的进步，要等于资本主义国家二十年的进步。

各单位都开大会，规定自己的指标，各单位之间互相竞赛，看谁的指标定得高。定高指标叫"放卫星"。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在一块儿开会，每个所都报告自己的指标。指标是以字数计算，一个单位说，我们的指标是一年出一千万字；另一个单位就说，我们一年出一千二百万字。那个单位又一合计，说我们再加二百万字，共一千四百万字！这样步步高升，好像打擂台一样，有些地方就是称为打擂台。真是你追我赶，可惜所追赶的并不是实际上的产品，而是纸面上的数字。有些研究所报的指标，也还有些依据，因为他们有些研究员可能有些积存的旧稿，旧稿拿出来也可以算数。可是有些指标，完全没有根据，既没有积存的旧稿，也没有在计划中的新稿，只是随便报数字，以多为贵，反正无论报多少，并不要当场兑现。

有一个研究所报告说，他们的翻译人员，产量最高，每人每天能翻译八万字。大家心里怀疑，要求当面表演。话已经说出来了，只得定期表演。结果证实，无论怎么样也翻译不出来八万字，就是抄写八万字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系里一位同志的爱人参加了表演，我们私下问这位同志，叫他讲讲他爱人参加表演的经过。他说，他的爱人的单位的领导，头几天就叫参加表演的人看将要翻译的资料，看了又看，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翻译的腹稿，到表演那天，上班就写，饭也顾不得吃，写了一天，还是不能达到这个指标。可是人在第二天就累病了，一直躺了好几天才起床。

在农业方面，在县与县之间打擂台，放卫星；各地区之间也打擂台，放卫星；省与省之间，

也打擂台，放卫星。经过一次打擂台，卫星就提高一次，到了省与省之间，经过省与省打擂台，卫星就真是高到九霄云外了。当时我们河南省对于大跃进最积极，在农业方面放的卫星很高。当时的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跃进的哲学和哲学的跃进》，他的跃进的哲学给河南人民带来了大灾难。因为下级向上级报了指标，上级就要按这个指标向下面征购粮食，没有生产那么多粮食，下级也不敢向上级说我那个指标是假的，再加上天灾歉收，那就只好竭泽而渔了。

后来吴芝圃到北京来，到我的家中来看我，带着检讨的意思说："我实在给河南带来很大的灾难。"我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是报了高指标，不过我们的高指标当时不要兑现，将来也不要兑现，只是说说就算了。生产方面的指标是要兑现的，兑不出来问题就大了。"

1958年北大的各系，都要下乡参加劳动。我们这个系分配到长辛店附近的黄村。在我们下去之先，黄村的同志来向我们介绍情况，据他说，他们的生产指标是每亩地产十二万斤。他们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绝招，就是杀狗，用狗肉作肥料。

等到我们下去以后，才知道，生产指标又提高了十倍，每亩地要产一百二十万斤，并且设置了试验田，上面写着一百二十万斤。我在村子的打谷场上劳动，看见场上堆积两大垛农作物，还带着秆子，占了打谷场的一半面积。我私下问一位老农，说："你看这两大垛能打多少斤粮食？"他说："大概可以打个四五千斤。"我说："照这样算起来，能打一万斤粮食的农作物，如果运到场内，就把场完全占满了。能打一百二十万斤的粮食的农作物，那就要一百二十个像这么大的场。上哪里去弄这么多的场？"那位老农也笑了。

那时候黄村还是高级社，后来是人民公社，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社里研究过怎么样种这些试验田，用什么方法能叫每亩生产一百二十万斤粮食。社员们到一块，所谈论的主要是消费问题。那时候轰动一时的就是办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可真是新鲜事，从来没有过的。从前有一副传统的对联：

放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

当时改成"放开肚皮吃饭"，反正不要钱，尽量地吃，吃得少了算吃亏，吃得多了算占便宜。干部们宣传说：第一步是在本生产队以内吃饭不要钱，进一步是在本公社以内吃饭不要钱，如此推下去，到最后走遍全中国，只要带着介绍信，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见饭就吃不要钱，那就是共产主义了。必要订规划，制蓝图，把五年、十年以后的黄村的样子描绘出来。还办画展诗廊，每人都得画

画做诗。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豪言壮语的诗。当时报刊上所发表的有一首诗说：

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黄村这个公社，还实行了十二包，一个人从生下来，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一类大事，共有十二件，都由公社包了，社员完全不用自己操心。我当时也写了十二首诗，题目叫《赞十二包》。可是没有多久，公社就包不起来了。仅只医药这一包，公社就包不起来。因为药不比粮食，公社总有一点积存的粮食，吃饭不要钱，暂时还可以对付，可是药是要拿现钱去买的，一点不能含糊。社员群众所最缺乏的也是现钱，有一个农村妇女对我说："社员们固然吃饭不要钱，可就是没有钱。我家里连一分钱也没有，买根针、买根线都是困难的。"随着十二包的作罢，我那十二首诗也不知去向了。中国真是文字之国，在当时的文字宣传之下，确实使人有一种感觉，仿佛是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了，至少说也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之外了。我当时也想，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是真大，如果中国这一次试验能够成功，这可真是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大贡献。

从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时松时紧，总的说来是越来越紧了。大概是因为，1957年反右的斗争使共产党某些领导人越来越觉得，知识分子靠不住，是一种潜在的对于共产党的威胁。也可能是，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共产党觉得，生产已经大跃进了，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赶上。

也可能是，由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需要彻底改造知识分子，从根本上防止修正主义。有些人认为苏联变修，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彻底改造，也可能这三种原因都有。无论如何，知识分子改造的势头越来越猛，范围越来越大，首先是拿艺术界几个人开刀，后来就扩大到整个艺术界，整个的文化界，又扩大到整个的教育界，认为当时的学校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非彻底改造不可。

本来在 1962 年春天在广州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有文艺界和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参加。据一位参加会议的自然科学家说，会议由陈毅同志主持。在会上，参加的人可以随便提意见，发牢骚，畅所欲言。陈毅同志回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会，他介绍了广州会议的情况，并且说："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有进步，在三年困难时期表现得都不错，现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还不能说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总可以说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听了这个报告都异常高兴，说这是对于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大会：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可惜好景不长，新加的冕不久就被摘掉了，已脱的帽又给戴上了。紧接着就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口号。

我们在学校里的人，起先是跟着批判艺术界和文化界，后来就停课闹革命。在北大哲学系，有一天我们这些教师正在开会学习，忽然有一支由学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队伍，气势汹汹地大踏步走进来，大喝一声："你们全给我站起来！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我讲话！我们是红卫兵，任务是革你们的命。"这支队伍命令我们首先自己检查，在解放以后写过多少文章，得过多少稿费。写文章就是放毒，稿费就是赃款。我们自己检查，文章有人写得多，有人写得少，有人没有写；稿费有得几千元的，有得几百元、几十元的不等。有一位先生说，我在解放以后，只得过一元五角稿费。大家都惊奇地问，什么文章这样短？他说："不是文章，是有个出版社叫我审阅一篇翻译的稿子，给我一块五角钱。"旁边另一位先生说："你还得到一块五角审稿费，我一角也没有得到过。"检查的结果，有些过去没有发表或写过什么文章的人，都得意洋洋；发表过或写过什么东西的人，都垂头丧气。写得越多的人，越觉得丧气。当时都觉得，写得越多，犯罪越大。多写多犯罪，少写少犯罪，不写不犯罪。

北大以内，有许多地方的名称都改了。"临湖轩"改称"反帝院"，因为那个地方原来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南阁"改称"五·二五楼"，因为南阁当时是哲学系办公室，而哲学系的人，是于 5 月 25 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

这些还都是徒托空言，不久就开始了抄家的实际行动。有些见过抄家的人告诉叔明说，"你们要准备呀，首先要把铺盖收藏好，他们抄家往往会把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没有铺盖，天冷了怎么办？"可是我们并没有准备，也无从准备。我们当时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坦白到底。到 7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坐着，听见有一支队伍，自远而至，高喊口号："打倒冯友兰！"我和叔明说："来了，来了。"我们刚走到门口，就看见红卫兵已经到了院内，他们拿出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个大字："封。"这一次只是查封。红卫兵告诉我说，"你的这些东西现在都属于人民了！"幸而这张封条不是贴在门上，而是贴在门内迎门的墙上，所以房子虽然被封了，我们还可以出入。又在门外贴了一幅告示，宣布我的罪状，并且规定了对于我的临时制裁，其中包括扣发我的工资，只按家中的人数，每月每人发给生活费十二元。当时我的子女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家中只有叔明和我二人，每月发生活费二十四元。我说："还有房租和保姆的工资呢？"他们说："你不必管了，由我们处理。"我和叔明以后就按着每月二十四元的收入生活。有一次我从外边回来，叔明说："今天有好吃的。"我说："什么好吃的？"她说："今天我上街，看见卖羊肉的，我买了一角五分钱的羊肉。"这样的生活，只过了几个月，以后生活费的数目逐渐增加，由二十四元增加到四十多元，又增加到七十多元。又过了一段时期，红卫兵又在我这院门口上贴上六个大字："冯友兰的黑窝。"当时燕南园住的大部分是教授，差不多每家门口都贴上"某某人的黑窝"字样。又贴出了一个"黑窝表"，写明某号是某某的黑窝，以便串联的人寻找。



燕南园居民委员会也开会，在会场中，各教授家的保姆，都有座位，教授夫人们都站着，让

各家保姆向各家夫人提意见。并且宣布，以后各家的夫人全部担负家务劳动，还要打扫园中的道路和公共场所，保姆们不参加劳动，工资照付。只有一个别家的保姆，向叔明提了一条意见，是她担任八大园居民委员会主任时，关于居委会的事。至于我家的保姆，则说相处得很好，没有什么意见。叔明曾任北京大学八大园民委员会主任将近十年，后来因为心脏病发作辞职。在动乱时期，除了这个保姆所提的一条意见之外，没有一个园子的居民来提意见或贴大字报的。这也是罕见的事。当时因为我的关系，燕南园还是罚她每天带头打扫园子内的道路和公共场所。这样，也持续了两三个月。

我的女儿冯钟璞（宗璞）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作，她也戴上了帽子，这是真正的帽子，用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冯友兰的女儿”。我的儿子钟越当时在沈阳航空方面的研究所工作，“冯友兰的儿子”也是他的罪名之一。

我的孙子冯岱正在北京六一幼儿园，因为他的父母远在沈阳，我是监护人。幼儿园的负责人给我来信，叫我把他接出来。我回信说，现在家里有事，让他就住在幼儿园里。幼儿园设在颐和园西边，下了公共汽车，还要走一大段路。叔明给冯岱送衣服被褥，下了公共汽车想坐个三轮车，三轮车都不拉她，她只得一手提着衣包，一手抱着被褥，一直走到幼儿园。她那时已经七十二岁，患有心脏病，这是很不容易的。见了幼儿园的负责人，他们说，园里已经决定叫冯岱“退园”（即开除）了。叔明说：“我们通知他的父母，从沈阳来接他，在未来接他以前，请求还让他在园里住。”那些负责人表现出很为难的样子，勉强答应了。叔明回来对我说：“孩子在幼儿园里不知道受多大委屈。我一到那里，别的孩子都往外跑，喊着冯岱的奶奶来了，可是冯岱坐在那里不敢动。”那时他才五岁。后来他的母亲到北京来了，也不敢进北大来，直接到六一幼儿园把冯岱接到沈阳去了。

在我被宣布罪状的第二天，红卫兵送来了“最后通牒”（这是当时的原名）：“限于明天五点以前，把你的封资修的书送到某楼某号室内。”我在限期以内去找他们，原来这个指定的地方就是学生宿舍里他们所住的房间。我说：“我所有的书除了马列毛主席著作以外都是封资修一类的书，数量不少，上哪儿去找运输工具呢？再说送来，你们这里也放不下。”他们一想，觉得是有困难，就说：“那就再看看吧。”后来又有一批红卫兵到我家里，说：“你的书怎么还不送？”我说了困难。他们说：“这个样子吧，我们在你这书架子上贴上封条，就不必送了。”以后再来的红卫兵，看见上面有封条，也就不再问了。这个办法，算是救了我的书。后来听说，有很多人的书都被搬出去了，搬来搬去，都成了断简残篇。

又过了几天，来了一大批红卫兵。他们不是来查书，而是来查东西。他们叫我站在前边客厅里，叫叔明带着他们到后边去搜查东西，真是翻箱倒笼，上自天花板，下至地下室，都搜查了。我在客厅里看见一个红卫兵拿着一张纸进来，他似乎是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他拿着一张红纸叫我看，厉声地问：“这是什么？”原来是一张斗方红纸，四周印上万字花边，原来是在别人家有喜事的时候，在上边写上大字，钉在幛子上用的。他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出了这张废纸。我给他们说明了用途，他们说为什么印上纳粹标志。我说：万字起源于印度，传到欧洲，也传到中国，本来的意思是‘吉祥’，形状是，就是这纸上印的，纳粹的标志是，这与中国的万字毫无关系。”这位红卫兵扫兴而去。我倒是很感谢这些红卫兵，因为他们还容我解释，而且还相信我的解释，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听说有些街道上的红卫兵，遇见类似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不由分说，先把当事的人痛打一顿。这样搜查了一两个钟头，他们走了。我到后边来看看叔明，知道他们把银行存折和其他单据，以及照相机和一些稍为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倒是给了一个收据，上边开列拿去的東西，其中有金元宝一只。我很惊异地说，我们哪里来的金元宝？叔明说，就是那个小孩的玩具。

当时北大还没有红卫兵的统一的组织。各系有各系的红卫兵。这个系的红卫兵来抄了家，那个系的红卫兵又来抄，有时发出相反的命令，我们不仅觉得烦扰不堪，而且觉得无所适从。有个系的红卫兵来了，看见我们的桌子上有一张我的大儿子冯钟辽从美国寄回的相片，他们大发雷霆，说："为什么有穿洋装的人的照片，这是崇洋媚外，赶紧把它烧了！"他们看着叔明把相片烧了。刚刚烧完，又来了另一系的红卫兵，看见院内有纸灰，又大发雷霆，说："你们刚才烧了什么？"我们说："烧了一张相片。"他们说："相片怎么能烧？这是消灭证据！"幸而原来的红卫兵还没有走，叔明说："是这些同志叫烧的。"这才算没事。后来，各系的红卫兵协商了一下，达成协议，一个系的红卫兵只能管本系的人，别系的人由他们本系的红卫兵管，互不干涉。于是哲学系的红卫兵来通知我们说："以后只有我们系的红卫兵来，你们才可以开门让他们进来，如果不是我们系的人，无论什么人来都不要理他们，无论他们怎样打门，都不给他们开。"这样，我们才比较安静一些。

也必须承认，有些群众也还是通情达理的，在大动乱的高潮时期，北大四门大开，随便出入，每天来北大的群众成千上万。有许多人晚上就在北大校园里空地上睡觉。我们那个园里，晚上也睡有许多人，连我的房子的门外平台上也睡满了人。那时已是秋天，夜里相当冷，可是没有一个人要求到屋里来。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家里只有叔明一个人，那天来了几百人要求进屋来看看。叔明不敢给他们开门。有个人出来隔着窗户对叔明说："你大概是怕我们人多，进去秩序不好维持，我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进去绕一圈就出来。我保证维持秩序。"他果然把外边的人组织起来，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人维持秩序。让叔明给他们开了门，他们果然按着次序，进来走了一圈，又出去了。他们都出去以后，那位组织者问叔明："你现在相信群众了吧？"叔明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群众，像这样的群众我相信。"

中国旧小说里，经常有一句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在当时，也是"祸不单行"。正在北大动乱的时候，我得了一场重病。我本来就有小便频数的病，经医生诊断，说是前列腺肥大。以前还可以凑合，后来就成为小便不通了。先到阜外医院诊治，他们说："如果要根治，需要动大手术，把前列腺割去。如果你决定要做手术，我们就把你转到协和。如果只要治标，可以先吃点药试试。"我当时心里想，北大现在正搞运动，如果去住医院，恐怕被说成是逃避运动。我对大夫们说，那就先吃点药试试吧。吃了药还是没有效，我就直接往协和去。协和的大夫们，在我的尿道里插了一根管子，小便暂时通了。那时候，在北京走一段路，确实困难极了。外省串联的人，从四面八方集到北京，公共汽车简直上不去。叫出租汽车，站上的人先问，你是不是有问题的人？如果回答说有问题，他就说没有车。

我千辛万苦地进了城，在协和看了病。我同叔明就住在钟璞那里。我带着尿道管子，小便还可以通，但是管子容易掉出来，如果一掉出来，小便就又不通了。这样时通时不通，身体越来越支持不住了。浑身不拘什么地方，只要动一动，就得费很大的气力。只得在一天晚上，又到协和去。到协和一看，协和已经不像个医院了，在候诊室里，在廊子上，在过道里，都是一个挨一个人。有的是等着看病的，大多数是外地串联的人到这里过夜的。医院的人推着饭车在那里卖饭，真像是一个火车站候车室。叔明和钟璞东奔西跑，费了很大的气力，总算是找来了一个大夫。那个大夫帮助插尿道的管子，插不进去。那个大夫说，需要赶紧动手术，不然怕要转成血中毒。我们说，那就动手术吧。那位大夫说，没有床位呀。叔明哭着向他请求，他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听说北京医院人少些，你们到北京医院去试试。"我们看协和实在没有希望，就叫钟璞先到北京医院去看看情况。钟璞去了，回来说，那里人确实是少些。于是我们就上北京医院。我原来的医疗关系是在北京医院，那是优待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在三级以上都算是高级干部，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后来知识分子降级了，把我降到阜

外医院。

因为北京医院以前常去，也许他们有人认识我，很快就找来了一位崔大夫。他说："要很快动手术，不过今天晚了，我们倒是有一张床位，你可以先住下，我用针刺把小便从膀胱里抽出来，明天再说。"他又很抱歉地说："这个床位可是在大病房里。"我在那时候倒是觉得只要能在廊子上有一张床，也就感恩不尽了。那一天夜里，只听见医院里吵嚷之声不绝，也不知出了什么事。第二天早晨，叔明和钟璞来了，她们马上就去找医院的人办手续，回到病房里对我说："医院里昨天半夜里被造反派夺权了，崔大夫还受了批评，说不应该让你进来。"

"我说："现在怎么样呢？"叔明说："医院里说：'既然进来了，可以先做一部分的手术，但是你们家属得写个保证书，保证无论在什么时候，医院里说叫他走，他就得走。如果你们在这个保证书上签了字，马上就可以动手术。如果你们不同意，他现在就得走。'"我们三个人商量说，事到如今，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叔明只得签了字。果然马上动手术。事后我们才了解，割前列腺的手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膀胱开一个孔，在肚皮上也开一个孔，插进一根管子，让尿从管子里流出来，用一个瓶子接着，把瓶子挂在腰间。过了一段时间，才割前列腺。北京医院的计划，是只准备做第一步，以后的手术，就诡称病人岁数太大，不能做了。"

第一步手术做了以后，在医院里住了几天，我同给我做手术的那位郑（也可能是姓陶）大夫也逐渐熟了，我问他第二步手术应该什么时候做。他说应该接着就做。我问对于岁数大的人是不是有困难。他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困难。我说："那你就给我做吧。"郑大夫说："不做，权不在我，你听听外面，就知道了。"我听听外面，果然有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口号。这位郑大夫也就在被打倒之列吧。又过了几天，医院下了逐客令，也不说什么理由，只说："医院决定叫你马上出院。"我说："手术还没有做完呢。"他们说："那我们管不了，反正叫你走就得走。"叔明和钟璞也没有办法。惟一的办法就是向北大革命委员会打电话，电话打不通，或是打通了找不着人。闹了一两个钟头，医院第二次派人来催了。他说："你们已签过字了，医院叫你们什么时候走就得走，还有什么道理可说！"他说话声色俱厉，我们只好出院，回到北大。

就在出院的第二天，红卫兵来了，说是在第一体育馆开会，叫我去参加。我告诉他我的身体情况。他说不行，要去参加。我只好拖着尿瓶子走到第一体育馆。那一次，被批斗的人不少，除了北大的人以外，还有周扬、蒋南翔以及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批斗以后，他们叫我在休息室等着，叫别人出去站队。又过了一会，他们说："你也回家去吧。"我出了体育馆，原来那些被叫出来站队的人，不知都上哪儿去了。操场上的群众，也都散了，一片空荡荡的。事后我才知道，那些别的被批斗的人，都被拉着在校内游行去了。当时称为"游斗"。我算是被免了游斗，这也是红卫兵们的仁慈吧。

我的病并没有根本解决，还是不行，插在膀胱的那根管子，有时候自己会掉出来。原来插在尿道的管子，如果掉出来，自己还可以试着再插。插在膀胱的管子，如果掉出来，那就非找医生不可了。插在膀胱的管子，还需要用橡皮膏把它固定住，日子久一点，肚皮上贴满了那种橡皮膏带，皮肤受不了，只得到北大哲学系革命委员会请求想办法。他们说，他们可以写一封介绍信，叫我们拿着信再到北京医院去试试。我和叔明到了北京医院，找着郑大夫，郑大夫说，他没有权，叫我们去找医院的革命委员会。

我坐在过道里等着，叔明拿着信去找革命委员会，一进门就放声大哭。他们问了情由，看了信，研究了一会儿，说这封信只是从政治上证明可以为他做手术，至于从医疗方面看，是不是有做手术的必要，他们还要再研究。叔明说："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请你们打电话问

问郑大夫。"他们就给郑大夫打了电话，郑大夫说绝对有必要。他们没有话说了，只好说，还不知道有空的病床没有。叔明说："请你们打电话问问住院部。"他们给住院部通了电话，住院部说有一个空位。这个革命委员会的人实在没有法子推诿了，只好说："你们去办住院手续吧。"我们听了，真是如逢大赦，庆幸有这样的机会，也庆幸碰见了这样好心的人。

当时就第二次住进北京医院。在病房里，碰见了两个病人，他们都是从工厂来的产业工人，他们说："我们刚一进院，就听说你被赶出医院的事，我们都非常气愤。"

住在医院等着动手术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小的障碍。郑大夫说："岁数大了，动手术时要输血，不然就可能有真正的危险。要用四百毫升血，医院里没有，你们得自己想办法。"事后我了解，在一般情况下，医院里是供给血的，这大概又是北京医院的造反派给郑大夫出的难题。叔明和钟璞又四下奔走，总算是找到了四百毫升的血。动手术一切都很顺利，手术后又过了两星期，就出院回家了。

哲学系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说是要调整教师的住房。对于有问题的人说，这就是要把他们的住房由好变坏，由大变小。燕南园是北大的一个比较高级的住宅区，住在这里的一般都是教授级的教师。据说，有一个学生曾经立下志愿，说是四十年后要住进燕南园。在大动乱时期，这句话成为一个批判的对象，成为北大资产阶级化的一个例证。对于原来住在燕南园的人说，调整住宅就是要把他驱逐出燕南园。事实上系革命委员会已经在朗润园给我找了一个住的地方，并且叫叔明去看过。据她说，房子只有两间，又潮湿，又阴暗。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并没有对我实行调整，可就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限制我在原来住房内的活动范围。红卫兵叫我搬出我的卧房，搬到另一间房子里，他们把我卧房的门锁了，把钥匙带走了，说是有事可以去找他们。我的衣服都被锁在卧房之内。应当换季了，叔明屡次去找他们要钥匙，他们总是推诿不给。学校里往往在夜里开斗争会，不管与哲学系有无关系，我们都被叫去"接受教育"，往往开到很晚，开到深夜。天气很冷，我还是穿着单衣服。卧房门的钥匙要不来，外面只有一个麻袋，还可以自由使用，我就拿它当大衣，披着去开会。后来陆陆续续，有别的住户搬进来，最多的时候，我原来住的这所房子住了六家。

燕南园的其他房子也都有新住户搬进去。燕南园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一两倍。住进我的这所房子的其他五家，有的是按正常手续搬进来的，有的是用"革命"手段搬进来的。有一家先来看房子，要住我原来的卧房和书房。他们说："你可以去找房产科，叫他们发住房证。"

有一天，下大雨，那位房客用两辆三轮车拉着他的东西来了。我们要看他的住房证，他说没有住房证，是房产科的科长叫他来的。他们说："空口无凭，他既然叫你来，为什么不发住房证？"他说："就是没有住房证！"他们说："我们一块儿到房产科去问问。"叔明同那位房客冒着倾盆大雨到房产科，倒是看见了那位科长。叔明问他："是不是房产科把那间房子分配给他？"那位科长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就是不说一句话。任凭怎么问，他就像木雕泥塑的人，闭口不说一句话。

在房产科不得要领，叔明又冒着大雨去找哲学系革命委员会。在那个时候，以聂元梓为首的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已经发生了动摇，反对派已经酝酿夺权。系革命委员会也不敢表态，他们只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看着办吧。"回来以后，那位房客就说："房子我一定要住，我怕你们没有劳动力腾房子，所以我来的时候已经带了两辆三轮车。如果你们不腾房子，我叫他们帮助你们搬。"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要自己动手了。我们只得腾房子，把书房的书像搬运砖瓦那样搬到别的房间里。后来那些书又从这间到那间，那间到这间，搬运过几次。

上面说我的书得救了，虽然是得救了，可是经过几次翻腾，书被搞得乱七八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整理出来。

有一次，我在系里学习会上，说到分房子的问题，我说：“有些住户并没有房产科的住房证，就硬搬进来住，好像是强盗。”这一句话又闯下了祸。系里开了一次批判会。专批判我那一句话，说是我诬蔑工人阶级。我说：“房子原来是我住，我就有责任保护那所房子，如果有人不按正当手续，没有房产科的住房证，就要住房子，我如果不加阻止，那我就是对学校不负责任。我是对学校负责。”在那个时候，这个道理是说不清的，也没有人理睬。

向聂元梓夺权的运动开始了。像社会上一样，北大分为两派，聂元梓的一派是当权派，叫“新北大公社”；另一派是反对派，叫“井冈山”。两派互不相让，派性越来越强，发展到武斗。我的院子里两扇大门也被拆走修筑工事去了。我的房子的背后有一座学生宿舍楼，不知是哪一派在楼顶上布置了阵地，居高临下，往下面打弹弓。我没有看见弹弓的样子，据我猜想，大概是像我在意大利看见的那样的打石炮弹的弩弓，不过子弹比较小，只有胡桃那么大。这个阵地上的人，见有来往的人，就往下打弹子，往往有弹子落在我这院里，有时打在玻璃上，把玻璃打得粉碎。若是打在人头上，伤势也不会轻了。我们这所房子住的几家，都在院子里做饭，做饭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

北大的这种两派对立的局面，继续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两派都认为是专政的对象，对于我们，两派各自发出自己的命令。如果某一派借着一个问题把我们批斗一次，其他一派也必然照样批斗一次，我们往往是受到双重的批斗。

在两派对立、武斗的局面下，在北大的人，无论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每天都好像是处在战斗之中。每天所听到的，都是两派互相叫骂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喊出来。还有弹弓的声音掺杂其间。最后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才把已经分裂的北大又统一起来。

工宣队进校的时候，大张旗鼓，意思是说，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是一去不复返了。以后要由工人阶级亲自掌握学校的大权，领导学校了。当时我也觉得，知识分子就是太不争气，照北大的情况看起来，他们是不能领导学校了。

工宣队进校，接管了北大，我当时心里想，这就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工宣队照部队的编制，把学校人员组织起来，把每个系编为一个连，师生混合编制，连长由工宣队成员担任。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南阁学习，快到下班的时候，哲学系的连长来了，他说：“你们先不要回家，都跟着我走。”他带着我们，走到朗润园的物料库，里边堆了许多稻草。连长下令说：“每人抱一捆，跟着我走！”走到了外文楼，他命令把稻草放在水泥地上。他说：“你们以后就住在这里，睡在这地上。我派些同学来陪你们。你们现在可以回家吃饭。吃罢饭在家里等着同学去接你们，也可以帮助你们拿东西。”我听说要同学们帮助拿东西，心里热乎了一下。当时有几句成语，说：“小学的学生看老师是亲人，中学的学生看老师是路人，大学的学生看老师是仇人。”现在要同学帮我们拿东西，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呀。

我回家吃饭以后，果然有个同学来了，是也帮着我拿了一点东西，可是到了外文楼以后，这些学生就下命令，叫我们把身上的铁器，如小刀之类，都交出来，履行了犯人进监狱的时候所要履行的那一套手续。他们原来是学生，可是在这里是监改人员，要对我们进行隔离审

查（后来才知道叫“隔离审查”，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名词）。原来在外文楼背后有几排平房教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平房改为接受劳动改造的人的住处，当时称为“牛棚”。那个地方总称为劳改大院。我们住在外文楼，隔窗户就可以看见劳改大院中的一切活动。经过观察，我才了解到，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劳改大院的边沿，大概是工宣队照顾我们这些年老体弱的人，不叫我们直接去住牛棚，只叫我们与牛棚为邻，稍微知道牛棚中的一点情况。实际上的待遇也确实很不同：住在牛棚中的人就是参加了劳改队，我们住在外文楼的人往往看见他们出工去劳动，每个人都是神情沮丧，气象愁惨，排着队慢慢地走向工地。我们住在楼里面的人也有劳动，不过劳动只限于扫外文楼和办公楼外边的马路。扫完了马路就进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背语录和老三篇，或者写材料，写关于自己的材料，或是别的单位来外调的材料。

在外文楼附近有一个食堂，每到开饭的时候，食堂的人就推着饭菜到劳改大队去卖饭。我们这边的监改人员，隔窗户看见饭车来了，就叫我们在毛主席像前站队，每个人都对着毛主席的像报告自己的名字和当时的政治“帽子”，然后排着队走出来，绕道进入劳改大院，吃完饭再回来。有一次，在站队报名的时候，有一位老年的老资格的心理学家，报了名字以后说：“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监改人员大怒，说：“什么问题？要说清楚！”这位老科学家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人告诉我我是什么问题，只是有人对我说你也是有问题的人，就叫我到这里来了。”他说的倒是实在情况，监改人员就不再问了。在我家里，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饭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到了1968年秋天，有一天，监改人员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里，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大篇，我揣测他的意思是说，你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又隔了几天，工宣队的总指挥，一个女工人，到了外文楼，又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问我说：“你在这里住着怎么样？”我说：“每顿吃饭都要到劳改大院，饭菜都凉了，将来冬天下雪，我出去走，怕摔跤。”她说：“你先出去，等我们再商量商量。”过了十几分钟，又叫我进去，总指挥又问：“学生们说你犯了什么错误？”我说：“就是反动学术权威嘛。”她说：“别的还有什么？”我说：“别的没有了。”她说：“那你就回家去吧。”我说：“什么时候？”她说：“现在就回，我现在就派人到你家里去，叫你家里人来接你。”她又说：“你也去收拾收拾东西，可不要叫别人知道。”我就去收拾东西，别人问我：“你要到哪里去？”我说：“我也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叔明推着小车来接我了，我们把行李等东西放在小车上，一同推着回来了。一进门，叔明就痛哭，她说：“刚才他们来通知我的时候，我已经大哭一场了。”

为什么对我这样地宽大呢？有人告诉我说：毛主席在一次中央的会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我不知道毛泽东究竟是怎么说的，我几次向工宣队提出请求，希望看看原来的记录，他们都满口答应，可是事实上是置之不理。无论如何，我

之所以能提前回家，显然是由于毛泽东的那个讲话。工宣队还叫我写信感谢毛泽东，据他们说，翦伯赞也写了。

与此同时，我的住房也有了部分的恢复。工宣队让插入这所房子的新住户之中的一户搬走了。我原来的厨房也腾出来了。这就解决了在屋檐下、在院子中做饭的困难。到了1972年，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我的那个住在美国的儿子带着他的全家回来探亲，要在家里住，工宣队又让新来的住户中搬走了两户，并以我家为“开放户”，就是外国人和华侨可以进入的户。新来的户只剩下一户了，它也于我那个儿子第二次回国探亲之前不久搬走了，至此我的住房才恢复了原状。

在我从外文楼回来以后，过了好几天，也没有人来谈以后要怎么办，我同叔明到哲学系去找连长，问以后怎么办。连长说：“那就来参加三十八楼的学习吧。”连长还说：“三十八楼是高铺，我给你安排铺位，等铺位安排好了，你就搬来住。”我就又搬到三十八楼。原来我认为在三十八楼学习的人都是没有问题的，我来同他们一起学习，总算是升了一级。后来才知道，在三十八楼学习的也并不是都没有问题，大多数的人也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往往经过小规模批斗。我猜想，在教师中，凡是岁数大一点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不过哲学系的教师，大概分为三等：问题最严重的是进劳改大院里住牛棚，其次是住外文楼，再其次是住三十八楼。

不过这三等也并不是专按问题严重的程度分的，也有些是照顾年龄大小和身体强弱而分的。我从外文楼到三十八楼，可以说是升了一等，可是这并不是说我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在三十八楼住了一段时间，工宣队叫我，还有别的几个人，回家住了。隔了几个星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叫我们搬回三十八楼去住。又过了几个星期，听说翦伯赞自杀了。

也许是怕我们也自杀吧，又叫我们回家了。以后不久，所有在三十八楼住的人，都回家了。

1972年6月间，谢静宜到我家来了。谢静宜常参加我们哲学系的学习，所以认识。她说，她看见毛主席了，毛主席叫她告诉我说，我给他的信他看见了，谢谢我。毛泽东并且派她向我问候，这使我很受感动。我写了一封感谢信，还作了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这首诗说：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若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写了两篇发言稿。这两篇发言稿，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有一天，《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碰见我，说：“你的那两篇发言稿很好，学报要。”我说：“要哪一篇？”他说：“两篇都要。两篇在同一期内都登出来。”果然不久都登出来了。不久，那位编辑跑到我家里来说：“你那两篇文章，《光明日报》都转载了，他们得到了你的同意吗？”我说：“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他们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也没有打过招呼。”那位编辑说：“很奇怪，学报也不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是要打招呼的。”这一天的报纸来了，我看见《光明日报》先登了第一篇，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还说，第二天要继续转载第二篇。《北京日报》也来接头，说他们也要转载这两篇文章，但是为了避免和《光明日报》重复，希望我把这两篇合为一篇。可以一次就登出来。

我照着他们的希望作了，他们也拿去了，说是第二天见报。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上登的，还是原来的那两篇，并且把《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也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北京日报》的编辑手里拿着“大样”来解释说：“我们原来是用的你新写的稿子，你看已经打成大样了，可是上边说不行，叫我们必须照着《光明日报》的原样转载，不能变动。”为什么？他们也不

知道。《光明日报》的那篇“编者按”很受重视，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还学习了一次。这些经过，从《北京大学学报》突然要登我那两篇稿子，到《光明日报》突然转载并加了“编者按”，到《北京日报》突然不用我那篇新写的稿子，虽然都是小节，可是都有点不很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说明什么呢？我猜想，那篇“编者按”大概有个来历。

后来在 1974 年 1 月 25 日国务院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谢静宜的一篇报告中得到一些线索。那个会我没有参加，别人告诉我说，谢静宜说，在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说到我那两篇文章，毛泽东一听说，马上就要看。谢静宜马上回家找着这两篇文章，回到会场交给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当场就看，并且拿着笔，改了几个字。甚至还改了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就发表了，她可没有说是毛泽东亲自叫发表的呢，还是下边的人揣测毛泽东的意思而发表的。也没有说，《光明日报》那篇“编者按”是谁执笔写的。无论如何，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方的群众向我鼓励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写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学生，有解放军，有农民，有工人；有的来自黑龙江，有的来自新疆；有些信写得很长，很好，有真挚的感情，有诚恳的希望。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孔批尊孔的道路。我不知道，这是走群众路线，还是哗众取宠。这中间必定有个界限，但当时我分不清楚。

照我现在的理解，这个界限就是诚伪之分。《周易》乾卦的《文言》说：“修辞立其诚。”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取意见，改正错误，这叫走群众路线。如果是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1973 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是前进一步。这是立其诚，现在看来也有并不可取之处，就是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

1973 年夏天，谢静宜到我家里来，说江青派她来问候我。

问候完了，就建议我写封信感谢，还不断有人来催。我当时认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代表毛主席的，问候我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毛主席、党中央对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

我就照这个意思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这封信交给了校党委。

1973 年这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当时宋柏年（北大党委政工组干部）对我说：“你不必天天到，当个顾问吧。”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只是挂个名，不一定有实际工作。因为宋柏年在此以前曾到过我家里，问我一些成语、典故的意义和出处，叫我帮他查书，大概还是要我帮着做这一类的事吧。

他们有事才来叫我，所以并不经常去。我去参加过一些批林稿子的讨论，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例如“天马行空”最初见于何书，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还是姓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最早见于何书，等等。有时也推敲一些古书，例如《易·系辞》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意义。

1975年他们曾来找我去看长沙出土的帛书《十大经》。他们有一个读书会，叫我去讲过一两次《韩非子》。他们写的有些关于批孔的稿子，有时也送我一份打印本。我当时集中精力修改《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于这些稿子，只大略翻一下，就放在一边。《论孔丘其人》初稿打印本也给我看过，我当时只认为是一篇考据文章，作为考据看，也算是用了些功夫，不过作为批孔丘，并没有很大意义。

1974年6月12日，大批判组通知我进城开会。先到大批判组聚齐上车，也没有说开什么会。车开到人民大会堂，进去一看，到的是北大、清华和中央党校的批林批孔班子。坐下以后，有人悄悄地对我说："等会儿领导同志来了，你说话别 嗦。"我不知道他打这个招呼是什么意思，只觉得这次会是不寻常。江青等人和一些领导同志进来了，走过每个人面前时都握手。江青走过我面前时说："本来想去看你，因为穷忙，没有去。"王洪文首先发言，说："你们的工作有成绩。"以后进入漫谈。江青发言最多，也最拉杂。归结起来，无非是说，凡是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的特点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抗战，反对投降。周亚夫打七国是阶级斗争，也是儒法斗争。漫谈将结束，江青又请叶剑英同志作总结。

叶剑英同志也讲了一段，大意是说，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会照当时的情形看，是江青主持的。她是这个会的主持人，也是主要发言人。因此我得到的印象是，江青是代表党中央向参加会的人布置评法批儒的任务。当时我认为，她的话必有所本，可能是毛主席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示，领导同志离开会场以后，有人说："今天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除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外，都出席了。"我的眼睛不好，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到会的人都兴高采烈，看起来他们都信以为真。

江青在要离开会场的时候，说："我在下面有几个点，最近要下去看看，你们也可以去。"隔了几天，大批判组将我叫去。到那里以后，谢静宜告诉我说，她们要出去一趟，问我的身体能参加不能。我说能参加。当时我想，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还没有出过北京，有机会下去看看也好。谢静宜说现在就要走，叫我回家拿着日用的东西，一起上火车站。她没有告诉我去干什么。

到了火车站以后，迟群、谢静宜已经先到了。她们让我走进一列"专车"，车上已经有不少的人。问他们，他们也都说不知道上哪儿去，去干什么。上车等了一两个钟头，车还是不开，我就先睡了。在睡梦中，听见有人说，到了，都下车。下车到站上一看，原来是天津。坐上汽车，到了招待所，这才吃晚饭。吃罢晚饭，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有人传话来说，大家都睡吧，有话明天说。第二天早饭以后，传下来了三条禁令：一不准写信，二不准打电话，三不准上街。还说招待所有个小花园，在小花园转转可以，可不能出大门。

我和同来的人到花园转了一圈，江青来了，原来她住在另一个地方，只有迟群、谢静宜同我们一起在这里住。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王曼恬，也跟着江青来了。江青召集去的人开会，开会时她先同王曼恬说："听说你们要请我们吃饭，不必请了，就算是个聚餐会，大家都出钱，这几个钱我们都还出得起。"她问我："你的工资多少？"我说："三百三十五。"她说："比我的工资还多啦！"她又对王曼恬说："你看，聚餐费都还出得起吧？"

接着她就拉拉杂杂地谈起来，也没有说这次来有什么任务，来的人有什么工作，只讲她的历史。她说她小的时候念过私塾。在私塾里，学生有错，先生可以用板子打手心。那种板

子又大又厚，挨起来可痛呀。可能是她挨过那种板子。后来她到山东大学，跟赵太侗、梁实秋学一点西洋文学。她说，梁实秋谈话很有意思。诸如此类的话，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两个钟头，也没有让别人说话就散会了。下午，在招待所看了一部香港影片。电影还没有看完，我就觉得浑身发冷，打战，发高烧了。我的左腿有一个丹毒的病根子，想必是丹毒又发作了。迟群送我到医院，医生诊断，果然是丹毒急性发作，就住医院。刚进病房，又来通知，换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医院。在那里一直住到6月底，家里人还不知道。后来有人先回北京，到我家里说了，叔明到天津来把我接回北京。

在医院的时候，医生对我进行了点滴治疗，躺在床上不能动。迟群来说："一切活动你都不能参加了，你这次到天津，就算参加会而不参加活动。"究竟是什么会，他也没说。后来听医院的人纷纷传说，才知道就在我进医院那几天里开了一个铁路工人主讲的批孔会。说是铁路工人主讲，可是江青讲的话最多。在发言开始以前，会场上宣布说，到会的有某某等人，其中也有我的名字。我这才了解迟群所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原来这个会名义上是铁路工人召开的以批儒为目的的会，实际上是江青召开的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会。她叫我们这些人去，为的是虚张声势。

我躺在床上，身子不能动，头脑还是清楚的。我以前也看过一些小靳庄的农民诗，我想农民还能写诗批儒，知识分子还不能吗？我就随口作了几首诗，让护士们写下来，越写越多，就成了后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咏史》二十五首。

其中有一首的两句是说武则天的："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两句诗最受批判，说是捧江青做皇帝。我当时的思想，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的，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算是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我之所以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认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国内国外的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

至于有些别的句子，有些人随意解释，例如这组诗的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说："深谢耆年带路人。"这个"耆年带路人"明明指的是毛主席，可是有人竟然说指的是江青，向来说，"诗无达诂"，可以灵活解释，但是灵活也不能灵活到这样的地步。

在我离开天津的时候，我们原来同去的那些人，大部分都已先回北京了。我是由天津卫生局派了一位大夫把我作为病员送回北京的。到了北京以后，紧接着又参加了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我那时候身体还没有复原，只参加了一些大会，小组会都没有参加，只是作了几首诗，《咏史》那一组诗中有几首是在这个时期写的。

在会议闭会的那一天，当时的政治局又接见了。还是江青讲话最多，她还说，可以在报刊上另开一个专栏，发表对于评法批儒持不同意见的文章。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后来并没有实行。接见以后，会议就闭幕了。在闭幕后回北大的路上，我对大批判组的一位负责人李家宽说："我以为还有个闭幕式哩。"他说："政治局接见就是最隆重的闭幕式。"

在这个会议上，《光明日报》的编辑找着我，说他们要发表《咏史》那一组诗，我叫他们去问李家宽。李家宽不同意发表，他说："对于历史上有些人的评价，还没有定论，如果先发表了，如果与将来的定论不同，那就不好办。"《光明日报》同李家宽交涉了好几次，最后拿了一个校样叫我看，并且说："决定发表了。你再看看。个别的字修改一下可以，句子不能改了。"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人作的，他没有说。

除了《咏史》以外，还在我的其他文章中提到我的几首诗。有一首是我生日自寿的五律，起首两句是：“水击三千里，人生二百年。”收尾两句是：“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开首两句出于毛主席早年的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主席这首诗虽未正式发表，这两句警句则流传甚广，我暗引了。我这首诗，起首是要学习毛主席对于人生的豪情，收尾是要跟随毛主席继续前进：这个意思首尾一贯，本不费解。所以“奔走在马前”是指在毛主席的马前。可是有人硬说是指江青的马前，其根据是据说江青好骑马，而不管全诗首尾的联系。这显然是误解。

1976年唐山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校党委会派人来叫我来，说江青来了。我赶紧起来，江青已经到了地震棚的门口。她进入地震棚以后，坐了几分钟，说：“地震还要持续很久，你们都要住地震棚，你能带头，很好。”叔明问她身体可好，她说：“在这个时期，好也得，不好也得。”一边说，一边就起身走了，外边已经聚满了很多人，大家都高呼：“毛主席万岁！”她走了以后，党委会的人叫我写感想，我说等明天早晨再说吧。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来了，我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说：

无数英雄战地天，红旗高举到前沿。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

我当时始终认为，江青是代表毛主席到北大来的，隔了一两天，党委会又派人来说，江青送来了两部电影，在五四广场放映，叫全校的人都去看。我心里想，江青大概是要学报上所说的一个公社领导同志那样，叫社员都去看电影以躲避地震。不过我们这个地震棚也就够安全的了。我对他说，我晚上出去不方便，不去看。第二天，两校大批判组中北大的人来说，江青又来了，叫我们去。坐上车，一直开到清华。原来江青先到了清华，在清华工字厅里边的地震棚里讲话。我进去以后，江青就问：“昨天五四广场的电影，你去看了没有？”我说：“没有去。”她说：“昨天晚上宝坻确实有地震。”当时北大党委的领导已经先在那里，江青说：“你们搭棚子还不是办法。”忘记是迟群还是王连龙说：“那您就下命令怎么办吧，两校的人都在这里，马上执行。”江青又说，她所以没有说看电影是躲地震，因为国务院不是这样说的。江青说完，就站起来走了。我坐的车也离开清华，开到朗润园大批判组。有人从里面出来对司机说：“他不参加。”司机就把我送回燕南园。在清华谈的时候，有些摄影记者照了一些相片，后来学校把它放大张贴出来，这些都是新闻照片，并不是摄影留念之类的相片。以上，我不厌其烦地讲了一些细节，以见“四人帮”是如何利用毛主席、党中央的威信，以欺骗人民，诱人跟着他们走极左路线的。我当时自以为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走的，鼓励我的那些群众也是这样想的，至少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当时也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

无论如何，经过“四人帮”这一段折腾，我从解放以来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我又回到解放初期那个时候的情况。这也可以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吧。可是又不然，还是有一件大事牵挂着，那就是祖国的旧邦新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

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了。我作了一首挽诗，说：世间梁栋折，天上大星沉。身负中华重，胸怀亚非春。辛苦为群众，艰难辅一人。前程遵遗志，莫让泪沾襟。到9月间，毛主席也去世了，我作了一首挽诗，说：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我又作了一首诗，说：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